

外国微型小说

Foriegn Miniature Novels



漓江出版社

威胁

[俄国]契诃夫

有一个贵族老爷的马被盗了。第二天他在所有的报纸上都刊登了这样一个声明：“如果不把马还给我，那么我就要采取我父亲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过的非常措施。”威胁生效了。小偷不知道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不过他想着可能是某种特别可怕的惩罚，很害怕，于是偷偷地把马送还了。能有这样的结局，贵族老爷很高兴，他向朋友们说，他很幸运，因为不需要步父亲的后尘了。

“可是，请问你父亲是怎么做的？”朋友们问他。

“你们想知道我父亲是怎么做的吗？好吧，我告诉你们……有一次他住旅店时，马被偷走，他就把马肚带套在脖子上，背着马鞍走回家了。如果小偷不是这样善良和客气的话，我发誓，我一定要照父亲那种做法去做！”

(选自《小说界》1982年第3期，杨宗建、唐素云译)

作者介绍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出生于小商人家庭。1884年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开始行医和写作。他的作品以幽默小故事的形式，嘲笑小市民的庸俗生活，并表现出对沙皇制度的否定，对俄国国民性中消极的历史积垢的深刻批判。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共约470多篇，著名的有《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第六病室》《苦恼》《套中人》《农民》《在峡谷里》《文学教师》《没有意思的故事》《幸福》《草原》《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等。

专家导读

[导读一]

笑着与过去告别

马被盗，主人极其郑重地登报声明，不把原物归还，必将遭受严厉惩罚。

做贼者心虚，出于畏惧而偷偷地把马送还。这类趣闻在生活中也时有所闻，主要用来讽刺那可笑的小偷。而契诃夫把这类趣闻写成小说，讽刺的对象不是小偷，而是马的主人贵族老爷。笑他的威胁恫吓只是银样镗枪头，一种虚假的贵族威势；笑他自诩父亲当年马被盗后的狼狈相，“背着马鞍走回家”；笑他阿Q式地庆幸自己，不必“步父亲的后尘”了。

这篇三百来字的小说，不仅笑料多，短小的篇幅似乎盛装不下似的；而且寓意深刻，令人在笑中深深地思考：为什么不把被讹诈的小偷作为取笑的对象，而把矛头指向贵族老爷？为什么贵族老爷要虚张声势，惹人耻笑？为什么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愚蠢还是以玩笑掩饰窘困？

小说结尾，这位老爷临了还在耍威风，说什么小偷要是不把马送还，“我发誓，我一定要照父亲那种做法去做！”这话看来只是逗人发笑的玩笑话，其实不然。契诃夫的这篇小说写于19世纪80年代，当时农奴制度早已被废除，贵族特权大大削弱。这位贵族的父亲失马后的窘态，足以证明贵族老爷早已没落，可他们传统的封建门第观念和特权意识仍然存在。他这“发誓”并非有口无心地耍嘴皮子，虽然自欺欺人，却是当真说的，以为“我发誓”了，必能称心如意，万事大吉。巴尔扎克的《古物陈列室》里的老侯爵要儿子发誓做骑士，老侯爵是个背时的没落贵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奥布郎斯基，把家庭搞得乱糟糟的，是个玩世不恭的没落贵族；契诃夫笔下的这一个，可谓是个既背时又玩世不恭的没落贵族。

契诃夫以讽刺手法和幽默语调，揭露贵族老爷的传统心理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外表与实质的矛盾，寥寥数语，活生生地刻画出他那色厉内荏的滑稽形象。结尾强化主题，要让人们笑着与过去告别。

一则趣闻，可以写成随笔、散文、故事、笑话。经过大师的提炼和概括，它成了微型小说。它以突出人物、力求传神为主要任务，同时，为此而设置悬念，以白描手法构筑小情节和小场景，并符合现实主义小说细节的真实性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要求。这篇“微型小说”从微型的特点和要求来看，的确是名副其实之作。

（汪小洋，江苏开放大学教授）



[导读二]

非常规的幽默

契诃夫是讽刺短篇小说之王。他认为：人性并不完美，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而是要真实而客观地写出现实生活中的幽默。而《威胁》正是让人们笑着与过去告别。

一个威胁，人们会知道伴随着相应的惩罚即将到来，被威胁者将如何处理呢？《威胁》中的贵族老爷，马被盗便发出了颇有声势的威胁，如果不归还被盗的马，就会采取其父亲采取过的非常措施对付盗马贼。盗马贼害怕贵族们过去惯用的残酷的权势，于是送还马匹，威胁生效。

微型小说的创作要别开生面，独辟蹊径，那就设法以不按常规的逻辑展开故事情节。如果盗马贼个性猖狂，不惧威胁，不还马匹，那就是常规的情节了。契诃夫设计的是威胁生效，而且突出了“非常措施”，引起了悬念。故事继续向前演进，最后谜底揭示，贵族老爷的父亲的“非常措施”只是自己“背着马鞍走回家”，一种无可奈何的窘态。这正是这位没落的贵族老爷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性格显现。贵族老爷越是严正、执着的语气，愈增添可笑的幽默情愫。

生活中威胁的故事多种多样，有成功生效的，也有不成功无效的。作品中威胁的生效竟然是依靠虚张声势。威胁与惩罚是一对因果相连的两极。如果只有威胁，没有惩罚，那威胁就失去力度，或者就构不成威胁，惩罚力度愈大则威胁的力度愈会攀升。贵族老爷的威胁中的惩罚居然不是针对对方，而是针对自己。威胁发展到惩罚是必然的。如果威胁惩罚对方，是常理，显示贵族老爷的权势。如果惩罚的是自己，则是悖理，显示贵族老爷已经没落、已经衰败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一般说来，威胁惩罚别人，是合乎因果链的故事，如果威胁别人，惩罚的倒是自己，这就是小说了。“小说的情节就在这一点上和故事分道扬镳了”（谢志强语），因为，契诃夫幽默的小说，是要写出人物精神境界和人性世界的深度，而故事讲究的是事件发展合乎情理的圆满，契诃夫小说艺术的经典性就在这里。

（凌焕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乞丐

[俄国]屠格涅夫

我从街上走过……一个衰弱不堪的穷苦老人拦住了我。

红肿的、含泪的眼睛，发青的嘴唇，粗劣破烂的衣衫，龋龋的伤口……哦，贫困已经把这个不幸的生灵啃噬到多么不像样的地步！

他向我伸出一只通红的、肿胀的、肮脏的手……他在呻吟，他在哼哼唧唧地求援。

我摸索着身上所有的衣袋……没摸到钱包，没摸到表，甚至没摸到一块手绢……我什么东西也没带上。

而乞丐在等待……他伸出的手衰弱无力地摆动着、颤抖着。

我不知怎样才好，窘极了，我便紧紧地握住这只肮脏的颤抖的手……“别见怪，兄弟；我身边一无所有呢，兄弟。”

乞丐那双红肿的眼睛凝视着我；两片青色的嘴唇浅浅一笑——他也紧紧地捏了捏我冰冷的手指。

“哪里的话，兄弟，”他口齿不清地慢慢说道，“就这也该谢谢您啦。这也是周济啊，老弟。”

我懂了，我也从我的兄弟那里得到了周济。

(智量译)

作者介绍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作家。从小受到德籍、法籍家庭教师的教导，不到十五岁考入莫斯科大学，读语言系，1834年转入彼得堡大学。读书时受卢梭的《忏悔录》、席勒和拜伦的作品影响很大。1838年到德国柏林去求学，1843年回国，在内务部当了一名十品文官。1852年因发表具有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的《猎人笔记》而一举成名。

屠格涅夫创作了《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等长篇小说。他的中、短篇小说中著名的有《木木》《阿霞》《初恋》《春潮》等。此外，他还创作过诗歌(其中包括82篇散文诗)和戏剧作品。



人性的光辉

屠格涅夫(1818—1883),俄罗斯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揭露农奴主和上层社会的残暴和不平等,同情底层人物的不幸命运,伸张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可贵。《乞丐》便是其人文思想的艺术表现。

首先,“我”作为作品里的主人公遇到了一个拦住我的乞丐。那一系列眼、嘴、衣、手等的细节描写,让这个不幸的穷苦老人,形象地站在我们的面前,博得“我”的关注和同情,跟一般好心人一样,随即会摸出一些金钱进行施舍。然而情节一转,“我”摸索全身,居然什么钱也没带,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行善施舍,一般人遇到此情况也就扭头便走了事。可“我”却感到“窘极了”的尴尬与无奈,甚至感到内疚。面对着不幸者的“等待”,主人公竟然只得紧紧握住那只“肮脏的颤抖的手”,真诚地表白:“别见怪,兄弟;我身边一无所有呢,兄弟。”这里的表白,似乎也是一种辩解:我想给的,可不知怎的,今天没带。特别两声“兄弟”的称呼,竟超出一般人对乞丐的态度。他把乞丐亲切地当作自己的兄弟。乞丐没有责怪他,冷眼他,因为不施舍的人十常八九。相反,乞丐受到了从未遇到的尊重,却也“浅浅一笑”,紧紧地捏了捏“我”的手指,真诚地道谢,称“我”谓“兄弟”,还说这也是对他的“周济”。这是比物质“周济”更为高尚难得的精神“周济”。“我”立即从乞丐回答的“周济”话语中,悟到了他从“兄弟”那里得到了更深层次、更可贵的“周济”,心灵上也得到了净化与提升。这里的“周济”,不是上等人对下等人、有钱人对穷苦人的“施舍”,而是尊重人为“兄弟”的互相“周济”,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他们之间是平等的,这里的“周济”融入人类“仁者爱人”的人格理想,也是人性光辉之所在。由此,让人想起了鲁迅的《一件小事》等一系列名作,关怀底层弱者,尊重不幸者的人格,为他们鼓与呼,这是一切有良知的作家的神圣职责。屠格涅夫在作品中表现的尊重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尚艺术命题,乃是人性的光辉,也是一切经典艺术的永久魅力。

(凌焕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办公室里的悲喜剧

[苏联]绍·契卡杜阿

机关办公室。靠近写字台坐着一个堂堂的男子，他正在拨电话。电话拨通了。

“是你吗，扎尔马？敬礼！（笑）老兄，你在坐着？我也是。你知道我今天什么时间上的班？——九点整！是啊是啊，分秒不差，我敢发誓。嘿，你猜钟表店经理跟我说什么来着？对，就是大街上那家钟表店。他们那么多闹钟，五天就销售一空！（笑）我已经是第四天按时上班了。一天连坐几个小时，都开始发胖啦——纯粹是苦役！好，你坐吧，裤子要准备坐破！（笑）”（放下话筒，拨另一个号码）

“扎姆舒特，是你？你好哇！你们那里最近如何？我们都规规矩矩坐着啦！我呀，到机关十二年，这才同好多人认识。什么？你那儿有人来了？电话挂掉，工作，工作，等会再打。”（放下话筒，随即又拨另一个号码）

“请喊一下波古阿扎。什么？因为旷工被开除了？……”（放下话筒）“不幸的波古阿扎，碰到风头上了！唉。”（拨电话）

“喂，劳驾您请昆特·萨姆帕洛维奇接电话。你就是？巧极了。你们那里怎样？噢，彼此彼此。有何感想？慢点，慢点，你的意思是——上班比在家好？为什么？噢，（笑）我懂了：在家，要叫你买土豆，取牛奶，忙这忙那，而上班就是坐着，只管坐着，是吧？怎么？你给熊了一顿？就因为迟到一小时？唉，坚持坚持吧。”（放下话筒，看表）“时间过得真慢，还有半个小时要坐。”

（电话铃响）

“喂，怎不说话？考验我是不是？我没走，坐着哩。噢，是你。你也考验我？（笑）……不行啊，亲爱的，你自己去买吧，上班买土豆的时代过去了。我忙得很，懂不懂？可别影响我。”（放下话筒。一阵连续、急促的电话铃声。拿起话筒）“莫斯科？对，是我挂的长途。我是尼卡？哦，是姑妈。您好，姑妈，我是沙阿班。尼卡上班了？萨沙呢？——也上班了。这么说，你们那里也上规矩了？代我转告一下尼卡，我来不了啦。好，姑妈再见！”（放下话筒）

“乌拉！十八点整，下班！”（穿大衣）

（一个女工作人员跨进办公室）



“沙阿班·拉古耶维奇！您刚才同莫斯科通了电话，现在向您收费。这是首长的吩咐。”

“我是在机关里打电话！”

“您打的是私人电话。请把首长的信件读一读，然后签字。”

（读）“按时上班——这并不代表一切，上了班必须工作。对于上班时无所事事者，工资拒付。”

“在哪儿签字？”

“这儿。”

“嗯……”（签字）

（选自《周末》1983年11月26日，吴争译）



作者介绍

绍·契卡杜阿(1932—)，格鲁吉亚作家，出生于阿布哈兹地区的农民家庭，1956年毕业于苏呼米师范学院。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写有小说《白与黑》(1961)、讽刺戏剧《我们当中谁耳聋？》(1964)等，其多部讽刺幽默作品曾被改编为电视剧播出。



专家导读

把无价值的东西撕开

这篇小说通过极其简单平淡的办公室一角的场景勾画，反映了全社会性整顿工作秩序的生动进程，写得颇有层次感和纵深感。

全文的实体内容是写一个“堂堂的男子”沙阿班·拉古耶维奇在办公室里打了六个电话，从而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显然，跟谁打电话，内容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作品以精心选择的对话，清晰地表明，通话者非亲即友；谈话的内容不是“哥们儿”的聊天通气，便是家长里短的攀叙。正是这些接连不断的电话，构成了沙阿班一天的全部工作内容。加之“乌拉！十八点整，下班！”（穿大衣）的描画，作品主人公否定性特征的审美倾向似已十分明朗。

然而，小说通过这些描写究竟要表明什么意图？与“悲喜剧”又有何联系？对此，我们可先从电话对答的片言只语所透露的信息中来加以辨析。电话连通着沆瀣一气的“哥们儿”，也沟通并传送着通话者们相同的话题，那便是对按

时上班的无可奈何。这一方面是对主人公否定性格的实质性正面展示,另一方面,用不同地点、不同单位同一类人的共同反应,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性整顿工作秩序的初步成效。尽管它还停留在外表乃至形式阶段,但较之不上班、无秩序、无纪律,则无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进步。其中对主人公们由于受工作纪律约束而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肯定性描叙,正是对这一进步的微弱肯定。而对主人公们“上班”内容所作的嘲讽,则正是对整顿秩序还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深切剖示。这种嘲讽的喜剧色彩,不仅与题名的“悲喜剧”有了若干联系,而且实际上为“悲喜剧”的点题作了厚实的铺垫。

作品的最后部分,以女工作人员传达“首长”的吩咐和信件,将作品所反映的矛盾关系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对整顿工作秩序的进程作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信服的深层展现:对私人电话收费,以及对按时上班却又无所事事者拒付工资。这对于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无疑是更进一层的“逼迫”。主人公束手无策的“签字”,既是他由“喜”而“悲”的转折,也是办公室工作秩序由“悲”而“喜”的深刻转折。

(袁玉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言传身教

[苏联]瓦·勃罗多夫

阖家三口人围坐在一张铺着天蓝色桌布的圆桌旁。爸爸在翻阅报纸,妈妈在绣坐垫,八岁的维佳在看书。

“爸爸,我有个问题弄不清楚,”维佳突然向父亲发问,“请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有些人会吵嘴的?”

“这不难,”爸爸把报纸放置一旁说了起来,“打个比方,我们的房屋管理员与庭院清扫工之间有了意见……”

“没有那回事!”妈妈打断了爸爸的话,“房屋管理员与庭院清扫工相处得很好。”

“这是我举个例子嘛。”爸爸辩解道。

“你不应该凭空瞎举这样的例子!”妈妈提高嗓门喊了起来。



“那就有劳你向孩子解释解释……”

“你总是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

“不是我推卸责任……是你爱找碴儿……”

“是我爱找碴儿?!”

“是的,是你……”

“不对,是你……”

“别吵了,”维佳插嘴说,“我明白了。”

(选自《小说界》1984年第1期,杨郁译)



作者介绍

瓦·勃罗多夫(1912—1996),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印度学家,参加过卫国战争。主要著作有《古印度哲学》等,为苏联科学院版《哲学史》(6卷本)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专家导读

童心诘问

在一个三口之家平静的生活中,一个未谙世事的八岁小孩,突然向他的爸爸提出一个弄不清的问题:“怎么有些人会吵嘴的?”童心未泯的小孩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其中必大有文章,藏匿着许多潜台词。

从爸爸回答开始,其实就是“吵嘴”活动的开幕:爸爸“打个比方”解释着——“管理员和清扫工之间有了意见……”没待说完妈妈就接上反对意见:“他俩相处很好”。于是爸爸辩解,妈妈提高嗓门批评:“不该凭空瞎举”。火气上来,爸爸请妈妈解释,妈妈决不示弱,“你爱找碴儿”步步升级,吵声提高八度,态度互不相让,最后只能互相指责,吵声不断,弄得面红耳赤。最后,小孩夹在中间,情绪激昂,也大声吼叫:“别吵了。”不知能否制止这场“吵嘴”戏的收场。同时,小维佳提出的问题,不需要用语言来解释,现实版的“吵嘴”戏他已经亲身经历过,于是,他终于“明白了”,明白什么?吵嘴并不为什么大事,双方个性很强,一言不合互相吵嚷,固执己见,口伐异己,情绪冲动,无法下场。这就是它的具体内涵。

小说不满三百字，却层次分明，层层推进直至高潮。开始平静温馨的家庭场面，由小孩的一个提问，一石激起千层浪，然后爸解释，妈反对，拉大嗓门，逐步升级，仅四个回合，就吵到不可开交，把情节推向高潮。两人的神态、动作、情绪、性格特点，都在这吵声中形象地呈现。直至小孩忍无可忍地大喝一声“别吵了”才戛然而止，为什么会突然刹车？父母从激情中清醒过来，在孩子面前觉得有愧，不该再吵下去而赶快收场。全文格局虽小，却演进有序，步步上升，水到渠成，一气呵成，有一个完整而缜密的叙事结构，具有尺幅千里之势，数语间勾勒出一个动态的、生气勃勃而又内蕴丰富的场景，实是微型小说的优势。

小维佳的提问是否是一种诘问？大有想象的空间。这一问，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中一浪就是引起了父母间的“吵嘴”，演绎了一场“吵嘴”的闹剧。千层浪中还有更多的疑问，小孩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因邻居和社会上人们“吵嘴”现象而无意间地提问，还是家中父母经常“吵嘴”而引发的有意提问？或父母这次吵嘴只是个别、偶发的事件？都值得我们深思。再有，父母的吵嘴，是他们的修养、个性缺陷所造成的，这种现象必将影响两者的感情和融洽的关系，如不适当控制和改进，必将会影响恩爱的夫妻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父母吵嘴的行为，将使儿女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种下了不良的种子，等他们长大了会结出令人想不到的恶果。父母是孩子无形的老师，自己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在教育着孩子，影响着孩子。由此，孩子的提问，是一种童心纯真的诘问，向天下父母提个醒，这就是小说超越小维佳具体的童心诘问，在精神层面上向人们发出一个有普适意义的警示性审美信息：父母们，请注意言传身教。

（凌焕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叶琳卡

〔苏联〕叶·米恩

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国外，离莫斯科很远很远。

这天晚上，我回到营房感到很疲倦。思乡的情绪又向我这颗疲倦的心袭来。



“快结束这一切吧，快回家吧。”我这样盼望着。

院子里，一个淡黄色头发、身体很单薄的小孩迎面走来。

“您好，叔叔。”她用一种异国的、但听起来像俄语的语言向我打招呼。

“你好，小姑娘。”我应声道。院子里有一块用平整的白石块砌成的空地，我们在空地旁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夜晚凉爽而宁静，山脚下的小湖仿佛蜷成一团在憩息。

“你叫什么名字？”我这样问着，很想与这新相识攀谈几句。

“叶琳卡。”她用明亮而又认真的目光注视着我，慢慢地说着自己的名字。

“你几岁了？”

“六岁，快七岁了。那您呢？”

“我么，你看呢？”

叶琳卡沉默了片刻，然后肯定地说：

“可能是十六岁了吧。”

我可爱的小叶琳卡啊，想必，这是你知道的最大数字了吧。我不想使她失望就附和地说：

“是的，你猜对了。”

我们默默地坐着。叶琳卡仔细端详起我军便服上别着的勋章，忧伤地低声说：

“勋章都不亮了。您怎么不擦擦呀？”

“没有擦。”

“可以用牙粉擦，也可以用小砖头磨。”

“是的。”我同意了她的建议。

于是我们又沉默了下来。

“讲个故事吧，叔叔。”叶琳卡请求说。

“从前有个国王，”我讲了起来，“他很老，很坏……”

“像希特勒那样坏吗？”

“比他还坏。”说着，我竭力装出很可怕的样子。

“不，没有比希特勒更坏的，”叶琳卡表示反对，“希特勒是世界上最坏的人。他把我们赶出了家，还偷走了我的爸爸。”

叶琳卡沉默不语了。又过一会儿，她悄悄地，仿佛是在讲什么秘密，对我说道：

“过去爸爸给我们来信，可现在不来了。也许是他把地址忘了。”

“也许是。”我重复着她的话。

又是一阵沉默。我焦躁地想，如何才能把叶琳卡吸引过来，使她不再想那些令人伤心的事呢？可我怎么也找不到话题。我已经完全不知该怎么跟孩子谈话了。

终于我又问了：

“叶琳卡，你说，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她用明亮而认真的目光望着我说：

“我想像妈妈那样，当个寡妇。”

她微笑着说出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大概她以为寡妇也是一种职业，就像当司机和清扫工一样。

看着小叶琳卡，看着她瘦削的双肩和像小溪一样蜿蜒在她背上的漂亮的辫子，我内心开始觉得惭愧，我怎么能疲倦呢？

（选自《当代苏联文学》1985年第3期，杨永红译）



作者介绍

叶·米恩(1912—1983)，俄罗斯作家、戏剧家兼批评家，出生于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写有多篇短篇小说、幽默故事和哲理性抒情小品文，曾常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政论文和戏剧评论。



专家导读

幼小心灵的伤痛

这是一篇构思精巧的微型小说。

叶琳卡是一个天真、纯洁而又懂事的小女孩，希特勒发动的法西斯侵略战争，使她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欢乐的童年，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战争的沉重阴影。“我”则是一个苏联红军战士，由于长期驻扎在外国，不时为思乡的情绪所困扰，对战争生活感到了疲倦。在一个凉爽而宁静的夜晚，“我”和叶琳卡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相遇了。面对着饱受战争创伤的小叶琳卡，“我”感到了一个战士肩负着重任，从内心为自己的“疲倦”而感到惭愧，重新振作起来，决心为千千万万个小叶琳卡的幸福成长而战斗。

小说没有从正面去描写法西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而是以小见大,通过叶琳卡一家在战火中家破人亡,不得不背井离乡的悲惨遭遇,揭露了法西斯战争的罪恶。特别是通过叶琳卡那瘦弱的身体、异国口音的俄语和数字概念的贫乏,她对希特勒的超乎寻常的痛恨,以及她微笑着说出“寡妇”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等典型细节,强烈地控诉了法西斯战争给下一代的身心造成的巨大创伤,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小说紧紧把握住战争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用散文诗一样的抒情笔调,细致地描绘了“我”和小叶琳卡这次短暂的然而又是令人难忘的会面和谈话,集中地突出了战争所造成的叶琳卡的言谈举止与身份年龄的不和谐,以及“我”与叶琳卡谈话气氛的不和谐。六岁,是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年龄,但战争的环境,却在叶琳卡幼小的心灵里装满了令人伤心的事,使她畸形地早熟,过早地懂得了忧伤,懂得了爱和恨。这使“我”与她之间本来应该很轻松愉快的谈话变得十分沉闷,以致“我”“怎么也找不到话题”,“完全不知该怎么跟孩子谈话了”。小说中先后五次写到了“沉默”,表明这次短暂的谈话始终是在一种忧郁的不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小叶琳卡的同情和对法西斯的痛恨,有力地深化了主题。为了孩子,我们应当奋进。

(陈飞,江苏省资深文化工作者)

妈 妈

[苏联]鲍·克拉夫琴科

一天晚上,我顺路来到朋友家。在沙发上就座以后,我们就聊起天来。突然房门开了,他的小儿子站在门口,边哭边喊:“妈妈,妈妈……”

“妈妈不在家,”我的朋友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说,“妈妈上班去了。你咋啦?摔跤了?自己摔的吧?那没什么好哭的。”他给儿子擦干了眼泪,又说,“好了,玩去吧!”

儿子走后,朋友抱怨说:

“总是这样!妈妈、妈妈的不离口。你知道吗,有时真让人觉得委屈。好像我就不如我妻子爱他,好像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专门是训人的,其实,我又给

他买玩具，又哄他。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我耸耸肩说，如果家里没有母亲，儿子一定会叫父亲。

“是这样的。”朋友同意地说，“就拿我来说吧，从小没有母亲。所以，我记得我一直是叫爸爸。”

我起身告辞的时候，他的妻子下班回来了。他们的小儿子也像变魔术似的出现了。他跑到妈妈跟前，讲起刚发生的事情来：说他怎样摔倒的，又如何痛，还怎么哭过。母亲摸摸他的头，吹吹他跌伤的手，还亲了他一下。我的朋友紧皱着眉头看着我们，嘟囔说：

“瞧瞧，这母子俩又亲热上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这位朋友在干活的时候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我们把他抬进休息室，叫了一辆“急救车”。他只是不停地反复叨念着：“妈妈。”



作者介绍

鲍·克拉夫琴科(1945—)，苏联作家，专门从事微型小说创作的工人作家，曾出版三本微型小说集。



专家导读

爱的真谛

《妈妈》是苏联作家鲍·克拉夫琴科的名作。鲍·克拉夫琴科是一位专门从事微型小说(小小说)创作的业余工人作家。他勤奋创作，已出版过三本微型小说集，在1979年苏联第七次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上获得好评，成为全苏联享有盛誉的作家。他生活在基层，经历丰富而深入，擅长于细微处显大千世界，于波澜处见精神。本篇正是从儿子生活的细节处自然地彰显母亲伟大的爱的真谛，蕴含着人类普遍的人性的光辉。

父母都爱着自己的孩子，可父爱总比不上母爱那么深沉和亲切。“我”从目击者视角，在生活的细波微澜中，形象地演绎着母爱的深层奥秘。

“我”到朋友家做客闲聊，他的小儿子突然边哭边喊妈妈，似乎在求助得到安抚和宽慰。可在家的父亲怎么做的呢？首先说你喊的妈妈不在家，继而一连串的问询，淡淡地安慰“自己摔的吧？没什么好哭的”，给儿子擦干眼泪又让他去玩了。在这里，朋友的一系列言行举止也揭示了父爱的深度和分量。作

为父亲，他向来访的朋友诉说出他的“委屈”：小孩总是妈妈不离口，一有事喊妈妈。其实父亲也是关心和爱护孩子的，他不是专门训人的，经常买玩具、哄他，也爱子情深的。“我”提出一个“怪论”：如果家里没有母亲，儿子一定会叫父亲。朋友则印证自己是单亲家庭，的确从小没有母亲，他就一直叫爸爸。似乎只有没有母亲时小孩才会跟父亲亲热近乎。

妻子回家了，小儿子变魔术般出现在妈妈跟前，诉说着刚发生的事情。作品细致地描绘了母亲是如何安抚孩子的：一边耐心地听儿子诉说，怎样摔倒，如何的痛，还怎么哭过，一边摸摸他的头，吹吹他跌伤的手，还亲了他一下。这对母子又“亲热”上了。从父亲和母亲对小孩这两个不同的安抚的场面和细节相比较，就看出了差异。父亲的安抚：大大咧咧，平平淡淡，不冷不热，居高临下。母亲的安慰：细心入微，耐心倾听，亲切抚摸，融为一体。父爱的确不如母爱之深切。

结尾处又一神来之笔，那位单亲家庭的爸爸在受伤之后在救护车上反复叨念着：妈妈，妈妈。这是生死关头中生命的最后一喊，道出了“世上只有妈妈好”的伟大母爱，从而揭示了人性中最普遍的、最深层的奥秘。

（凌焕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法律门前

[奥地利]卡夫卡

法律门前站着一名卫士。一天来了个乡下人，请求卫士放他进法律的门里去。可是卫士回答说，他现在不能允许他这样做。乡下人考虑了一下又问：他等一等是否可以进去呢？

“有可能，”卫士回答，“但现在不成。”

由于法律的大门始终都敞开着，这当儿卫士又退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弯着腰，往门里瞧。卫士发现了大笑道：“要是你很想进去，就不妨试试，把我的禁止当耳旁风好了。不过得记住：我可是很厉害的。再说我还仅仅是最低一级的卫士哩。从一座厅堂到另一座厅堂，每一道门面前都站着一个卫士，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就说第三座厅堂前那位吧，连我都不敢正眼瞧他呐。”